

## 绪 论

“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而对被“全球化”的人来说，被“全球化”的意义大体上是相同的。

一切流行之词往往都具有相同的命运：它们试图透明化的经历越多，它们本身就会越晦涩难解。它们所排挤和取代的正统真理越众，它们就会越快地转化成不容置疑的标准。这一概念原本企图包罗的人类实践已渐渐从人类视线中消失。如今，正是“客观事实”；“那边的世界”的特质才是这一术语似乎要澄清的，才是这一术语声称它是不容置疑的依据。“全球化”也不例外。

本书旨在揭示全球化现象远不止表面所见而已。在探析全球化过程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后果的同时，它试图拨开围绕在这一术语周围的某些迷雾——这一术语自恃澄清了当今的人类状况。

“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

的多层面改变。对那时 / 空压缩的社会因果作一考察 人们显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时空的用途本身是截然不同的，也是相互区别的。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它们之间，这两大紧密相联的过程将全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每一部分人口的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截然地区别了开来。对某些人看上去是全球化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本土化。对某些人来说全球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由，而对许多其他人而言，它则是残酷的飞来横祸。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

不管愿意与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移动着。即使我们原地不动，我们也在移动着：在一个永恒改变的世界中，静止不动并非现实的选择。然而，那一新状况的效果却是大大不同的。我们中的有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球人”；而有些人却被固定在其“本土”——在这个由“全球人”定调和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中，这是一个既不愉快又不能容忍的处境。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由于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全球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社会梦想 / 慰藉 原来也不过如此。

全球化种种过程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反映和表达被全球化了的人们经验的新部落和原教旨主义倾向，与广为推崇的高级文化——全球化了的高级文化——“杂交”一样，也是全球化合法的徒子徒孙。人们担忧的一个特殊缘由是日益全球化和超越疆界的精英们和其余的越发“本土化”者之间沟通的不断崩溃。意义和价值生成的中心社会已超越疆界从本土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然而，这并不适用于此类价值和意义旨在贯穿和领会的人类状况。

当今的两极分化以自由流动为中心，呈现出许多侧面。这一新中心对贫与富、游民与定居者、“正常”与反常或违法这种传统的区分作了新的阐释。两极的这种种层面到底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这是本书试图探讨的另一复杂问题。

第一章论述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时空本质与社会组织的形式和规模间的联系——尤其是当今时/空压缩对全球的和区域的社会和社团的构成造成的种种影响。其中探讨的影响之一就是新型的“在外地主现象”即全球精英们挣脱了政治和文化权力单位的疆域桎梏而获得的新独立及其随之而来的后者“权力的丧失”。新等级制度的“上层”和“底层”各自所处的两大背景的分隔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当代大都市变化着的空间组织和变化着的“邻里情谊”的意义。

第二章的主题是为争夺阐释和强调共同空间意义的权利而展开的一系列现代战争阶段。据此本章分析了过去的全面城镇规划的冒险周折和当今设计的支离破碎和为排斥他人而大兴土木的倾向。最后，详察了曾经作为最受喜爱的社会控制的现代模式的全

景监狱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它目前的非相关性和逐渐的消亡。

第三章阐述政治主权的前景，尤其是阐述处在全球化之中的经济、金融和信息状况的国家社团和更加广泛的区域社团的僭越和自治的前景。人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制度化决策领域与决策和其实施所必需的资源生产、分配、拨款和调度领域日益扩大的规模间的差距，尤其是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政府——就绝大部分现代史而言，它们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未被替代的有效社会管理中心——的决策力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第四章评析上述演变的文化后果。我认为其总体效应是人类经验的分裂和分化，而共同的文化标记可以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流动”对新等级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和底层人物分别具有迥然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意义，而人口的主体——在这两极间摇摆的“新中产阶级”——则在那对立中首当其冲，经受着严峻的生存不确定性、焦虑和恐慌。我的论点是必须缓解此种恐慌和消除恐慌所潜有的不满，这一必要性本身就是进一步分化流动性两大含义的强有力因素。

最后一章探讨那两极分化的各种极值表达式：当今对理想化标准以下的事例所作的刑事化处理倾向和刑事化处理在通过将另类生活，即固定性生活的图景和现实描绘得更加反感作呕来抵消“流动生活”中的苦楚所扮演的角色。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无生存保障这一复杂问题往往被简化成一个一目了然、直截了当的“法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对“安全”的关注——多半缩减为对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的担忧——“大大超出负荷”。人们对当代生存其他至关紧要的方面——无保障和不确定性——忧心忡忡。

本书的论题并非政策宣示。依作者用意，它是一篇讨论性的论文。其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没有悉数提供解答，而且也没有对当今发展倾向的未来后果作出一个完整连贯的预测。然而，正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所言，我们现代文明的当代状况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停止了拷问自己。不提出某些问题充满了危险，这比无法回答已进入官方议事日程的问题更加危险，而问错了问题往往有助于将人们的视线从真正重大的议程中转移开来。沉默的代价是以人类受苦受难来偿付的。毕竟，问对了问题就使命运与目标，飘荡与旅行成了天壤之别。对表面上无可非议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前提提出质疑，这可以说是我们对人类同胞和我们自己的当务之急应尽的义务。首要的一点，本书是一次提问题和激励提问题的演习——当然，它不敢妄自尊大，宣称自己提对了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问题都是已经提出过的。

## 第一章 时间与阶级

“公司属于投资者——而不属于它的雇员和原料供应商，也不属于它所在的地区。”<sup>①</sup>著名的现代企业“合理化”倡言者艾伯特·邓拉普（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家德尼·杜克洛风趣而准确的称呼，他是把肉切成碎块的人——“切肉者”、“分割者”、“肢解者”）<sup>②</sup>在那份有关他生平活动的沾沾自喜的报告中是这样总结他的信条的。时代图书出版社为了启蒙和教诲所有寻求经济发展的人们出版了这一报告。

邓拉普所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用另一个名称来指代纯法律范畴的所有权问题。这个“归属”问题没有什么争议，故而不需要再作什么说明——更不用说这种郑重其事的重申了。邓拉普所考虑的主要是这句话的其余部分的含义：即，雇员、供应商及社区的代言人对“投资者”作出的决定没有发言权，而真正的决策者，也就是投资者，则有权利不假思索地对这些人就其经营公司的方式所提出的任何要求加以拒绝或宣布为无关和无效。

请注意：邓拉普的话并不是一个意向的声明，而是对事实的陈述。邓拉普想当然地认为，他这句话说明的道理已久经考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任何别的事实都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如今它已经成了真理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些真理都可以用来

解释世界而它们本身却不需解释；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断言世界上的事情，而它们本身却不再被视为断言，更不会被视为是有争议的、可辩驳的断言。

曾几何时 要不是我们大家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急剧缩短 使得一个星期不但在政治上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人类记忆中更是极长的一段时间 你也可以说是“不久以前”)大家似乎都觉得邓拉普的宣示很不明了：它听起来倒更像是一个战斗口号或一份战场报告。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针对地方自治发起歼灭战的早些年间 商人们一个个都觉得有必要登上保守党年会的讲坛，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一条讯息。他们认为有必要再三讨论是因为这条讯息在耳朵还未调音的人听来简直是太离奇、太不可理解了：一些公司乐意支付地方税收，以支持他们需要的道路建设或下水道维修 但是它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得为失业者、残疾人和其他被遗弃的人付税，他们不想为这些人的命运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但那是在那场战争的早期岁月。那场战争只过了 24 年就几乎取得了胜利。也就在这时邓拉普宣布了他的信条。他完全可以期待每一位听众的认同。

争论那场战争是在无烟的公司董事会议室恶意而秘密地策划出来的，还是由于新的科技和新的全球竞争的神秘力量带来了很多变化，使得原本坚定不移地热爱和平的工业领袖感觉到了战争的必要性 或者它到底是一场预先策划、及时宣布、目标明确的战争 还是只是一系列分散的、常常是出乎意料的类似于战争的行动 (每一行动都有各自的原因) 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 它们都可以提出很好的理由 但是这两种理由极有可能

只是互相比较劲而已），完全有可能的是，本世纪的后四分之一将作为伟大的空间独立战争而载入史册。在那场战争的进程中，决策中心及这些决策中心赖以作决定的计算，为了从地域束缚——即地方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们不妨更仔细地看看邓拉普的原则。雇员是从当地人中间招聘来的——他们可能受诸如家庭义务、家庭财产等的负累——很难随公司迁往别处。供应商得运送供给品，一旦公司易址，当地供应商低运输成本的优势马上就消失殆尽。至于“地方”本身——显然，它只能留在原地。不管公司新址在哪里，它都无法改变它的位置。在所有对公司经营有发言权的人中，只有“投资者”——即持股票者——才根本不受空间约束；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证券交易所，通过任何一位经纪人购买股票。地理位置的远近及公司的距离是决定他们购买或抛售股票最次要的考虑因素。

原则上，持股者的分布根本不由空间决定。他们是唯一真正不受空间局限的因素。公司属于、也仅仅属于他们。因此，他们可以决定换一个他们探明或预测将有机会分得更高利润的公司，而把舔伤口、修复损失及处理垃圾的任务留给别的人——那些受地域限制的人。公司是可随意迁移的；但迁移的后果则注定会遗留久远。无论是谁，只要能自由地逃离这个地点，就能自由逃离这种后果。这些是胜利的空间战最重要的战利品。

在外地主，标志

在后空间战世界中 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

会阶层的因素 每天 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对于那些处在新的等级体系顶部的人来说，移动的自由带给他们的好处远远超过列入邓拉普方案中的好处。邓拉普方案只注意能发表自己见解的竞争者 给他们提升或降级——那些人能够并很可能会诉说 不满，把牢骚转化为申诉。但是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固守一地，被社会隔离和抛弃 而邓拉普方案却对他们只字不提 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投资者”——即拥有投资所必需的资本和资金的人——具有的流动性 意味着权力与义务 对雇员的责任、对弱小者及子孙后代的义务、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自我再生的义务 之间新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无条件的分离。一言以蔽之 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繁衍的责任他们统统不必担负。在权力的域外性与“全部生活”的持续地域性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对称——如今 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不作准备或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见机行事，可以自由地利用它，而且可以不顾其后果。避免为后果负责任是新的流动性带给自由流动、不受地方限制的资本的最令人垂涎、最珍贵的好处。这样一来 在计算投资效益的时候 处理后果的成本就无须考虑在内了。

资本的这种新的自由使人想起昔日的在外地主。他们臭名昭著、遭人怨恨是因为忽视了那些养活他们的人的需要。只要他们拥有的土地存在‘搜刮’剩余产品’就是他们唯一的乐趣。这两者之间当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比较并不能充分说明 20 世纪后期流动资本所具有而在外地主绝不可能拥有的无忧无虑和

不管不问。

后者不能拿一块田产和另一块田产交换，所以只能跟他们牟取暴利的地方或多或少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给他们的剥削加上了现实的制约（从理论上和法律上来说，这种剥削本来是没有限制的）以免将来他们的收入来源会越来越少，或者完全枯竭。诚然，从总体上看，真正的制约往往比已知的制约严重，而这些制约也要比在实际中观察到的严重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居住在外土地所有者往往会对土地施加一些永远无法修复的损害，从总体上影响土壤肥沃和农业丰产，也使得在外地主的财产岌岌可危，过不了几代就要衰败。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真正的限制，因其不可见性和不遵从性而使得它们的存在更显得残酷。正如阿尔贝托·梅卢奇所说，这种限制“代表禁锢、边缘、隔离，因此它也表示对另一性、不同性、不可征服性的承认。这种遭遇另一性的经历使我们经受考验，作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努力，它从中孕育出武力缩小差距的诱惑，而同样地，它也对交流提出了挑战。”<sup>③</sup>

有别于现代早期的在外地主的是，现代晚期的资本家和土地经纪人，由于其流动资源的新的流动性，并没有面对真正的——坚实的、强硬的、抵抗的——限制来强制服从。能使他们自己被人感知、被人尊崇的唯一限制就是政府对资本和资金自由转移所施加的限制。可是这样的限制是很少的、罕见的，而且在强大的压力下，仅存的那一小部分限制也将被清除或干脆淘汰掉。没有了这种限制，也就不太会发生梅卢奇所说的“遭遇另一性”的情况了。即使另一方强加这种遭遇——一旦“另一性”开始施展威力，资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卷起铺盖去寻找一个更热情好客——不加抵抗

温驯柔和——的环境。因此也就更不会产生‘用武力缩小差异’的企图或接受‘交流的挑战’的意愿了。

这两种态度都隐含着对另一性的不可征服性的承认。但是，“另一性”必须首先把自己建构成一个抵抗的、不屈不挠的、真正抱成一团的整体才能被看作是“不可征服的”。而它这样做的机会却在急剧减少。要获得真正能构成整体的能力，抵抗需要一个持续而有效的攻击者——但是对资本和资金来说，它们几乎没有必要去勉为其难去排除障碍或者去克服、减少抵抗。这是新流动性的总体效应；即使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它们也完全有可能会被弃之不顾去钟情于更柔和的选择。如果与“另一性”打交道要诉诸代价高昂的武力或烦人的协商的话，资本总是能转移到更和平的地点。假如躲避就可大功告成，那当然就无须周旋了。

### 移动的自由和社会的自我僭越

回顾历史，人们可能会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地球物理的种种因素、自然的和人为的领土边界、人口和文化区域的各自特性，以及“里面”和“外面”的区分——这些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一切对象——在本质上不过是“速度限制”的概念派生或物质沉淀/手段——或者更笼统地说，是施加于移动自由的时间和成本的限制。

保罗·维里利欧最近指出，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终结”为时过早，我们却可以越来越有信心说目前正处于“地理终结”期。<sup>④</sup>距离已不再重要，而地球物理边界这一观念在“现实世界”中

越来越难以为继。突然之间，一切都似乎非常清楚，大陆和地球作为整体的划分是因为交通的原始和旅行的难度而使得距离产生格外真实的结果。

其实 距离是社会的产物 而绝不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物质的‘已知事实’（它的长度随着覆盖它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在货币经济中，则随着达到该速度所需要的成本而不同）。回顾起来，构建、分隔的所有其他社会产物和集体特性的维护——如国家疆界或文化障碍——似乎都只是那速度的副产品。

我们不妨注意，这似乎正是“边界事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造成阶级分层现象的原因 在过去 正如今天一样 那些富有的、权力在握的精英分子总是比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人更有都市化的倾向；他们自始至终总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普通人无法摆脱的边界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与边界外的精英分子比与他们同住一地的其他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也似乎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力的精英代表比尔·克林顿最近首次宣布国内外的政治没有区别的原因。确实 在精英分子的生活经历中很少有‘这儿’和‘那儿’、‘里面’和‘外面’、‘附近’和‘远处’的区别。随着通讯时间的剧减以至缩短至瞬间，空间和时间标志已不再起作用，至少对那些可以以电子信息的速度行动的人来说是如此。

“‘里面’与‘外面’，‘这里’与‘那里’，‘附近’与‘远处’的对立记载了周围世界各种组成部分（包括人类和兽类）的驯服、归化和熟悉的程度。

附近 即就在手边 通常是平淡无奇、再熟悉不过的 有些人每天都会看见，有些事情每天都要处置，它们已经跟我们的习惯紧密

相联 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附近 '是一个使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 在这里人们很少会感到迷失 很少会感到不知该说什么或怎么做。相反“; 远处 '却是人们很少涉足或从不涉足的空间 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人们无法预料或理解; 一旦发生了什么事 人们会觉得不知所措: 这个空间包含有人们不了解的东西, 人们不存希望 也觉得没有去关心的义务。发现自己置身于' 遥远的 '空间是一种令人紧张不安的经历 冒险去' 远方 '意味着到某人视野之外, 意味着感到别扭及不得其所, 意味着招惹麻烦和害怕受伤。

由于以上这些特征“; 远与近 '的对立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自信与犹豫之间的对立。在' 远处 '意味着处于麻烦之中——因而它需要机灵、活络、机敏或勇气 需要学习别的地方用不着的陌生的清规戒律, 需要通过危险的尝试和常常是代价昂贵的错误来掌握它们。另一方面“; 近处 '表明胸有成竹; 不费吹灰之力养成的习惯就可以应付, 而且因为它们是习惯, 所以有无足轻重之感 且毫不费力 也不会导致焦虑和犹豫。我们所熟知的' 地方社团 '就是在' 这儿 '和' 那儿 “; 附近 '和' 远处 '的对立中才得以存在的。

交通方式的不断进步是现代历史的标记。交通和旅行是变化尤其巨大、迅速的领域 这里所谓的进步 正如熊彼特很久以前指出的, 不是把马车的数量加倍的结果, 而是新的交通工具——火车、摩托车和飞机——的发明和大批量生产的结果。正是由于人们可以获得快捷的旅行工具, 才触发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 总和 '的削弱和损害 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进程。滕尼斯第一个在他著名的现代化公式中描绘了这个从共同体(Gemein-

schaft 到社会 Gesellschaft 的过渡过程。

在流动性的所有技术因素中，信息通讯——那种不涉及物体或物体只作为微不足道的次要方面的通讯——起的作用尤其巨大。技术方式稳步持续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而独立传播——也脱离传播对象而传播，也就是说，技术方式使‘示意者’不受‘被示意者’的约束。信息移动与其载体及对象的脱离反过来导致了它们的速度的区别，信息能以比载体快得多的速度传播，可在信息告知对象发生变化之前到达。最后，以计算机为服务器的万维网终结了——就信息而言——“旅行”和要旅行的“距离”这种观念，使信息在实践中也和在理论上一致，在全球范围内瞬间可达。

最新发展的成果是巨大的，信息通讯对社会联系 / 分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冲击已广受关注并被详尽描述。正如人们只有在斧头坏了之后才能了解‘斧头的本质’一样，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时间、空间所起的作用，更了解把两者从结构上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和稳定性 / 变通性以及社会的 / 文化的和政治的总和的消亡。我们现在明白，以前所谓‘组织严密的地方小团体’是由于小范围社区里面，其大小由‘湿件’（即人脑的内在质量决定，因此受人类视力、听力和记忆力的自然限制）的瞬间完成的交流和区域之间传播信息需要的大量时间和花费之间的差距才得以产生并保持活力的。另一方面，目前社区的脆弱和短命则主要是这个差距缩小或干脆消失的结果。如果两者都非常快速的话，社区内的交流比之于社区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优势。

米夏埃尔·贝内迪克特总结了我们回顾性的发现以及对旅行速度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新的理解：

那种小社区之内由于声音传播、海报和小册子的几近同时性和零成本才可能存在的联合现在大规模崩溃了。任何规模的社会凝聚都是共同的意见、共有的知识的作用，而且由于没有不断的更新和相互影响，这种凝聚主要依赖于早期严格的文化教育和记忆。反过来，社会变化也依赖于忘却和廉价的通讯。<sup>⑤</sup>

我们要补充的是这段话中最后一句中的“和”字是多余的。容易忘记与通讯的廉价（和高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独立看待。廉价的通讯意味着信息的快速到达，也意味着信息泛滥，意味着已获得的信息很容易被忘记或被弃置不顾。至少从旧石器时代起，“湿件”的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现在廉价的通讯也没有使它获得滋养和巩固，反而使记忆饱受信息泛滥之灾。很多人认为，在最近的发展之中，最重要的是在当地范围内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息的成本差距缩小（只要是通过万维网发送信息，无论发往何处，你都只需付“当地电话”费。这种情况具有同样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反过来，这意味着最后终于到来并鼓噪着要求得到垂青，要求进入和停留（无论是多么短暂）在记忆中的信息往往发端于最繁杂和相互自主的网站，因此很可能会传播互相矛盾、互相抵消的讯息——这刚好与社区内不借助于硬件和软件，只依靠“湿件”而传播的信息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讯息往往相互重复、相互加强并助长（选择性）记忆这一过程。

正如蒂莫西·W.卢克所言：“在传统社会中，空间性是根据无中介的普通人体的能力来组织的”：

对行为的传统的想像常常是借助于人的器官来作比喻：冲突

是颞对颞的 战斗是手对手的 正义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  
辩论是心对心的，团结一致是肩并肩的，团体是面对面的，友  
谊是臂挽臂的，而变化则是一步一步的。

现在 随着这些行为方式的进步 冲突、团结、战斗、辩论和正  
义的伸张都已超出人类的眼睛和手臂的能力所及范围，整个形势  
也已变得面目皆非了。空间被“加工 / 集中 / 组织 / 标准化”最重要  
的是从人体的自然限制中被解放出来了。从此，正是技术的能力、  
它的行动速度及其应用成本才“组织了空间”：由这种技术规划出  
来的空间是大不相同的 它是建造出来的 不是天生的 是人工的，  
不是天然的；它以硬件为媒介，而不是直接通到湿件的；它是合理  
化的 而不是社区化的 是全国性的 而不是地方性的。<sup>⑥</sup>

由于是建造的 现代空间就必定是坚韧、牢固、恒久和绝对的。  
钢筋混凝土是它的肌肉，铁轨和公路是它的血脉。现代乌托邦的作  
者们对于社会的和建筑的秩序、社会的和领土的组合与分割不加  
区分 对他们来说——就像对那些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代人  
一样——有序社会的关键在于空间的组织。社会总和将是一个范  
围更大、包容更广的地域等级制度，盘踞在顶部的是一个超地方的  
国家权威，它居高临下，审视一切，而它自己却不受日常的监督。

在那构建的领土 / 城市规划 / 建筑学空间之外，人类世界的第  
三个电脑空间已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来临而出现了。根据保罗·  
维里利欧的说法，这个空间的元素是“不含任何空间的特性，却有  
不同凡响的即时传播的特性。从此，人们不再被物质的障碍和时  
间的阻隔分离。随着电脑终端和录像监测的接合，这儿和那儿的  
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sup>⑦</sup>

像大多数对这种人类状况所作的描述一样，这种描述并不完全正确。“计算机终端的接合”已经对不同种类的人的处境造成了不同的冲击。有些人——事实上是相当多的人——像以往一样，“仍然能被物质障碍和时间的阻隔分离开来”只是现在这种分离更加残酷，而且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也比以往更加深刻。

### 新速度 新分化

简而言之，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 / 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对某些人来说，这预示着史无前例的自由，使他们能够无视物质的障碍，享有闻所未闻的远距离移动和行事的能力。对其余的人而言，这预示着他们再也不可能享用和安于这块他们没有机会弃之而去的土地。由于“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因而被距离所分隔的地域也失却了意义。然而，这对某些人意味着自由，而对另一些人却预示着患上了空虚症。当今之世，有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撤离任何地方，而其他的人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所居住的惟一的地区从他们脚下移开。

当今，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而传播，身体在空间上的移动和重新定位对于意义和关系的调整不再像以往那么必要了。对某些人来说——对那些可随意来去的精英分子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形役”，意味着权力处于新的失重状态。精英分子们穿越空